

清风正气歌

松树的风格

■王俊杰

寒来暑往，四时更替，却见松树长青。

“我每次看到松树，想到它那崇高的风格的时候，就联想到共产主义风格。我想，所谓共产主义风格，应该就是要求人的甚少，而给予人的却甚多的风格；所谓共产主义风格，应该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事业不畏任何牺牲的风格。”这是老一辈革命家陶铸在《松树的风格》一文中写的话。

1951年，陶铸胜利完成了广西剿匪任务。返回武汉途中，他第一次顺路回到阔别20多年的家乡湖南祁阳。中午到达县城时，县里为他备了一桌接风酒。他得知后，坚持不去。他找到在县一中工作的哥哥，到学校的教工食堂吃了饭。

当时，哥哥另加了几个菜，他问：“这饭菜是由你自己掏腰包请客，还是由公款报销？”哥哥说：“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钱，保证不措公款一分钱的油，你就放心大胆地吃吧！”

听了这话，陶铸才笑着说：“这就好，这就好！我们干革命工作，搞社会主义，头一条就要公私分明，一丝不苟。你今天的情意我领了。”

回家步行到山口时，他看到乡亲们做了一块金匾迎接他。他拉下了脸，对乡亲们说：“光宗耀祖不是我们共产党员干的事。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，不是家庭权势人物。别搞这一套，不然我就不回村了。”

村里的乡亲想让陶铸多带几个族中侄辈出去，在城市安排个工作，让家乡“沾沾光”。陶铸坚决拒绝了他们，说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，不是旧社会的官老爷，不能搞‘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’的事情啊！”

陶铸的母亲长期住在农村，有好几次，组织上打算把陶铸的母亲迁入城镇落户，陶铸都严词拒绝。他说：“农村老人那么多，你们都迁了，再考虑我母亲。”就这样，他的母亲直到1962年病逝前，都一直住在农村。

1958年，陶铸带领干部到粤东调研生产情况。接待单位为表示欢迎，大摆宴席。他见到这种场面十分气愤，匆匆吃了碗白米饭就退席了。之后，他每次外出调查，总是事先“约法三章”：不准迎送、不准请客、不准送礼。说了还不够，他还要随同工作人员督促检查，具体落实。

一次，他到番禺县大石公社住了一段时间，蹲点调查研究。他每餐吃的都是见不到多少油花的萝卜、白菜。别的同志有时还可以加一点鱼肉，他却坚决不要，拿出自备的辣椒、腐乳，捧着大碗饭就吃了。

1961年，陶铸在视察工作时又定下“三不吃”的规定：不管到了什么地方，一律不准招待，不吃鸡、不吃肉、不吃鱼，只吃素菜，发现超过规定的饭菜，立即令人撤走。

陶铸在广东工作近15年，几乎跑遍了全省100多个县、市。在他身边工作的警卫员老张记得，陶铸一年在广州待的时间还不到100天，经常下乡，一去就是20多天到一个月。每次到农村，陶铸总是步行入村，访贫问苦，开调查会、座谈会，与社员和基层干部促膝谈心。这15年里，他和妻子曾志一直住在采光条件欠佳的军区大院旧房子里。机关同志多次提出给他修缮住房或换房，陶铸都不答应。他常说：“生产上不去，住那么好的房子，吃那么好的饭，心里过意不去，群众也不答

应。”后来，由于妻子曾志患病，医生坚持让她多晒太阳，陶铸这才同意对居住了10多年的旧房进行维修。然而，房子修好后，陶铸一天也没有住，就奉命调去北京了。

1963年春节，外贸部做了一批试样点心，用以出口换外汇。有人给陶铸送一箱过去，请他“品尝”。陶铸收到后，马上亲自给那人打电话说：“请你马上把东西收回去，谁也不许不花钱品尝。要品尝，自己花钱买，以后不许这样干！”陶铸不仅坚持将自己收到的点心退回，还吩咐秘书问问其他同志是否也收到了，要求收到的一律退回。

由于工作原因，他有出国的机会。每当这时，他常常用自家的钱，为公家置办急需之物，但从没想过要给自己买点东西。有一次出国，公家发了些外币，他想到省委招待所没有吸尘器，便买了一个，带回来送去。有一年去莫斯科，他没有给女儿买礼物，却用自己为数不多的津贴，为广东粤剧团买了一台放映字幕的幻灯片。

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回忆，父亲经常对身边人说：“我干一辈子革命，没有任何要求，只是希望死了以后，人们在我墓前立块牌子，什么官衔和生平事迹都不要写，只写上‘共产党员陶铸之墓’8个字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在《松树的风格》一文结尾，陶铸这样写道：“具有这种风格的人是越来越多了。这样的人越多，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也就会越快。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像松树一样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崇高的品质；我希望每个人都成为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。”

感悟红安“革命母亲”

■张彦昕

之势南下时，她跑到公路边，看着长长的行军队伍，拉住一名战士问：“同志，看见我的儿子伯山没有？”战士告诉她：“在后面，他会回来看你的。”然而，一行又一行解放军官兵走过，她始终没有等到那张熟悉的脸庞。

在兰桂珍老人的照片前，我看到她脸庞上的一道道皱纹里藏着苦难与沧桑，却依然难掩她的坚强。

作为“支前模范”，兰大妈积极组织妇女扩红，帮助红军家属解决困难。她动员丈夫程启忠带头参军，并亲自把他送到招募处。在她的带动下，当地掀起了“妻送夫、母送子”的参军热潮。

1931年夏收时节，刚刚收割完稻谷的兰大妈母子，被地主武装团团围住，年仅9岁的大儿子被活活打死，粮食也被全部抢走。面对无米下锅的困境，她只能带着家人四处乞讨。年仅2岁的小儿子，死在颠沛流离的乞讨路上……

亲历了旧社会的黑暗、遭受了种种苦难，10多年后，兰大妈坚定地送另外2个儿子参军，还动员了丈夫的五弟、六弟参军。革命胜利时，她已失去了父亲、丈夫、4个儿子、4个兄弟……她说：“虽然没有骨肉血亲，但我的心早已跟革命融为一体，共产党、红军就是我的亲人！”

这两位“革命母亲”的故事令人动容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徐大妈和兰大妈不因自己是烈属而要求特殊待遇。1956年，徐大妈被红安县和黄冈专区评为烈军属模范。组织奖给她的衣料，被服部被她申请换成农具、肥料，带回去交给了农业合作社；娘家侄女邀请她留在城市生活，她也拒绝了。她说：“我有农业合作社，我要回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，还要为社里工作。”兰大妈被组织确定为优抚对象，她将组织给她的生活补贴积攒下来，用于救济贫困户和穷孩子；70多岁时，她还坚持每年上交公粮和养殖的肥猪。

像徐大妈、兰大妈这样的“革命母亲”，在红安有很多。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，我读到了更多关于“革命母亲”的感人故事，认识了一

个伟大的母亲——“母女同就义”的冯振觉，“舍子保伤员”的陶子荣，“严守党的秘密”的万永达……她们的故事，让我深感震撼，她们的品格令人敬仰。沉浸在纪念馆肃穆的氛围中，我的耳边又回响起前些日子听到的一首歌曲：“河那边是什么，是绵延的战火/她望着远方泪一滴滴落/和平来了/他们走了/她等的人再也回不来了……”

红安的红，颜色和烈士鲜血的红一般。革命烈士纪念馆静静地矗立着，“140000”这个沉甸甸的数字醒目地镌刻在墙面上，猛烈地冲击着我的心灵。数字下方，密密麻麻地铭刻着22552名烈士的姓名。

漫步在庄严肃穆的纪念馆，我仿佛看见一位位刚毅的母亲，以坚忍的姿态扛起家国大义。她们深知战场的残酷、革命的艰险，却毅然将至亲送上革命的征程。在送别丈夫和孩子的时刻，她们眼中噙着泪水，心中藏着无尽牵挂，用沉默的凝望诠释着“为有牺牲多壮志”的革命情怀。正是这份超越个体悲欢的家国大爱，让今天的孩子们得以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下，自由舒展生命的羽翼。



长征

第6474期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我要去寻根。前不久，我应邀回到故乡湖北随州，参加乙巳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系列活动。该活动已连续举办17届，今年以“烈山问祖·华夏铸魂”为主题。参与其中，所见所闻令人深受触动。

其实，我一直都在寻根。自幼时起，我的心里就揣着个问号：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要往哪里去……寻根的问候，伴随我走过40多年军旅生涯，如今蓦然回首，发现它不仅是陪伴我的影子，更是一粒种子——幼年播种萌芽，然后不断生长、开花结果，而那根须，则在悠悠岁月里盘成了血脉的模样。

18岁的时候，我穿上军装当了兵。新兵下连后的第一天，我在黑龙江绥芬河边防的界碑前站岗。零下30多摄氏度的气温里，雪花狂舞，北风怒吼。不大一会儿，身穿棉衣外裹羊皮大衣、头戴加绒棉帽、脚穿反毛皮鞋、戴着羊毛手套的我，就被冻透了。

这时，班长过来查岗。他指着界碑上的“中国”二字，大声对我说：“小张，你知道咱为啥站在这儿吗？因为这就是咱军队的使命——保卫国家的神圣领土。”然后，班长关切地问我冷不冷。我坚定地回答：“不冷——刚才还有点冷，现在真的不冷了！”班长问为什么，我脱口而出：“为了祖国和人民！”

1987年，我申请去了前线。和我同去的，有个四川籍的战士小钱。每次战斗前，他都要摸一摸、看一看口袋里的全家福。那天战斗打响后，他冲在最前面，倒下时手捂着衣袋。我俯身细看照片，是他站在爹娘后面、在土坯房前的合影，不远处是他家的几亩稻田。那一刻，我懂了，我们扛枪打仗，不就是为了守住那片土地，守住千千万万小李爹娘播种的希望田野，守住千千万万小李爹娘房顶上的袅袅炊烟吗？

当时我在参战部队政治机关做宣传传工作，有时也帮助整理烈士档案。一次，在一位年轻战士的档案里，我发现一封他牺牲时揣在怀里尚未寄出的家书，以及尚未交给组织的入党申请书。家书和入党申请书上都浸染着他的鲜血……我逐字逐句地读着，读到最后已是泪流满面：“总之，我想成一颗钉子，把党的性质、宗旨和章程钉在老百姓的心坎里。”我把他这句话抄在笔记本上，30多年过去了，尽管纸页已经泛黄，那字迹却越来越清晰。

前线的猫耳洞里闷热潮湿，为了防止胸前的党员徽章生锈，我和战友都用透明塑料将党员徽章包裹并不时取下擦拭。我被评为“火线优秀共产党员”那天，领导举着煤油灯，带领我们重温入党誓词。当时，尽管我的嗓子有些沙哑，但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砸在洞壁上——那不是喊给别人听的，真的是喊给自己心底那团火听的。

我在新疆时，部队有个维吾尔族战士叫艾力。有一次，我下部队跟他所在的小分队巡逻时，遭遇十年不遇的暴风雪。我和他分到一组，饥寒交加、口渴难耐之际，他把仅有的半壶水塞给我，自己则徒手抓把冰雪填进嘴里。我



铁打的营盘

■郭宗忠

离开很久的营盘突然会在我的梦里出现 那些连在一起的平房 铺着稻草的地铺 东北的严寒 都被新兵连的热情融化

记得老家在公主岭的班长他教会我唱第一首军歌 排队长去操场去训练场 军歌也在这队伍里嘹亮 铁打的营盘啊 班长已是一个响亮的称谓

在这里 我成为一名军人 踢出的第一个正步 是坚定与坚决的雷厉风行 在这里，我学会了奉献与牺牲 铁打的营盘啊 我随时听从着号令

寻根漫笔

■张明刚

问：“艾力，你咋不喝水？”他张开裂裂的嘴角笑了：“我要保障你活着回去！”这使我深切感受到，人民军队的根基，从来不是冰冷的武器装备，而是官兵之间血脉相连的革命情谊、生死与共的战斗信任，更是党旗下“为人民服务”的铮铮誓言。

去年参加党日活动时，我们去看望一位百岁老党员。他颤颤巍巍地拿出珍藏的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，打开磨得发亮的封面，里面有他用红笔在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”下面画的波浪线。“张同志，”他拉着我的手动情地说，“你问咱党的根在哪儿？我告诉你，它就在老百姓炕头的热乎气里，就在咱党员弯下腰帮老乡插秧的脊梁上。”阳光透过窗根照在他胸前的党员徽章上，那光亮晃得我眼眶发热——信仰不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言行，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把心血和汗水融入泥土后长出的参天大树。

二

记得20岁那年，我利用第一次从部队回家探亲的机会，带着一本泛黄的族谱，来到山西洪洞县，站在了那棵大槐树下。古老的大槐树静静伫立，见证着岁月的变迁。导游说，第一代大槐树虽已消逝，但第二代、第三代大槐树仍然延续着生命的传奇；因为它们的根深扎故土，虽历经沧桑，依然旺盛。

4月的春风裹着槐花的清香，槐花枝叶在石刻“张氏迁徙”几个字上投下明暗忽闪的影子。导游说，明洪武年间，我的先祖就是从这棵树下挑着扁担往南走的。我抚摸着树干，那皴裂的纹路像是父亲的手背——他临终前握着我的手叮嘱说，咱们张家祖辈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来的……“你可别忘了根啊！”

那时我才6岁，还不懂“根”是什么。直到后来在河北清河张氏祠堂，看到族谱上“挥公封张”的记载，我才明白：原来我的姓不是随便打印在户口本上的符号，而是从黄帝赐姓那天起，就将弓箭的形状刻进骨髓里的印记。祠堂里供奉着牌位，香火缭绕，烛光闪烁，



■任国旺

班公湖之韵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班公湖，地处西藏阿里日土县西北，素有“长脖子天鹅”美誉。从日土县城出发，一路上，山挨山、山挤山，山背山、山抱山，灰色的山脊勾勒出仿若天鹅轮廓的天际线。

天边的雪峰似在尘世之外，山脉连绵，褶皱间流淌着地质纪年的沧桑。粗糙干裂的山体，是岁月镌刻的印记；嶙峋裸露的岩石，是褪尽浮华的赤诚。山体或土黄，或黑褐，光秃无草木，宛如历经万年风霜的老者。初看枯燥单调，然而当你凝神静赏，便能发现其下立地拔天的筋骨，那是穿越万年的不朽。一种神秘力量悄然包裹周身，顺着毛孔渗入细胞，流入血脉，滋润肺腑，刹那间，人与山融为一体。仿佛喀喇昆仑精神在此诞生、卫国戍边英雄群体在此涌现，皆因这里能让人感知昆仑之巖的脉动，

映照历代先祖的名字。我默默驻足观看，静静地与先人进行心灵对话。见我神情专注、态度虔诚，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走过来，指着墙上的《张氏家训》对我说：“娃啊，咱老张家的根，不是在大槐树下的黄土里，而是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灵魂里。”

离开清河那天，我在祠堂门口捡了块碎陶片。后来才知道，那是汉代的器物残片，上面刻着个模糊的“张”字。抚摸着它，感觉像是触摸到了先祖的指纹和脉搏——2000多年前，他们就用锄头在田间或用毛笔在纸上，把一个大大的“张”字写进历史的年轮里，也写进后辈们的血液里。

今年清明，我带家人回随州祭祖。大家蹲在炎黄雕像前，用树枝在地上画出一个大大小小的“炎”字。我告诉他们：“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汉字，而是咱们华人的胎记！”春风吹过碑林，仿佛有千万个声音在说：亲人们，一定要记住你是谁，记住你是从哪里来。

在拜谒炎帝神农大典上，我见到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代表，祭拜同一个人文始祖的壮观场面。当编钟奏响时，晨光正从神农大殿的飞檐上流淌下来，落在点燃新火的5名孩子红扑扑的脸蛋上。在瞻仰圣像时，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，捧着一束稻穗，仰着脸看炎黄雕像，睫毛上还闪着泪珠。这时，我想起小时候长辈人给我讲起的炎帝和黄帝故事，说咱们都是“炎黄子孙”，血管里流着老祖宗的勤劳、智慧和善良，要好好做人，不能辜负了祖宗。

参观炎帝农耕文化展示区时，我看见一个新石器时代的耒耜，刀口还留着磨削的痕迹。几千年前的祖先，就用这样的工具，在华夏大地刻下了农耕文明的根。神农百草园里，艾草和菖蒲长得齐腰高。有个老者正在清除杂草，锄头起落之间，泥土翻出深褐色的纹理，像极了农耕文化代代相传的脉络。

三

于我而言，故乡已成驿站，参加完寻根节活动，我即返回。常住北京，坐在书桌前，我便会看看窗外的梧桐树。春天新叶冒出时，总能让我想起大槐树下的风；秋天落叶铺满台阶，又像是老山前线阵地上的红土。有人问我寻根这么多年，到底寻找到了什么？我指着心口说：根，就在这里，就在每一次想起故乡时的心跳里，就在军装口袋里的入党誓词里，就在给孩子讲炎黄故事时那闪亮的眼眸里。

前几天整理旧物，我翻出年轻时在边防写的日记，其中一页写着：“树高千丈，落叶归根。可咱们军人的根长在哪里呢？要我说，它就长在听党指挥的军魂里，长在边防的界碑里，长在老百姓遇到困难呼喊‘解放军’时的热切期盼里。”如今回头看，这话像块石头，已在心里沉淀、打磨了几十年。

或许人这一辈子，就是在不停地寻根。寻着寻着就明白了：根不是某个具体的事物，而是血脉里流淌的基因，是信仰里坚守的忠诚，是脚踏大地时那份沉甸甸的踏实。

寻根，就是要把祖宗的魂，忠诚的根、信仰的光、文化的脉……变成一粒粒种子，种进子孙的心田里——让他们知道，无论自己是谁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无论在干什么，血脉里都流淌着一种可以让生命拔节的力量。

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班公湖，地处西藏阿里日土县西北，素有“长脖子天鹅”美誉。从日土县城出发，一路上，山挨山、山挤山，山背山、山抱山，灰色的山脊勾勒出仿若天鹅轮廓的天际线。

天边的雪峰似在尘世之外，山脉连绵，褶皱间流淌着地质纪年的沧桑。粗糙干裂的山体，是岁月镌刻的印记；嶙峋裸露的岩石，是褪尽浮华的赤诚。山体或土黄，或黑褐，光秃无草木，宛如历经万年风霜的老者。初看枯燥单调，然而当你凝神静赏，便能发现其下立地拔天的筋骨，那是穿越万年的不朽。一种神秘力量悄然包裹周身，顺着毛孔渗入细胞，流入血脉，滋润肺腑，刹那间，人与山融为一体。仿佛喀喇昆仑精神在此诞生、卫国戍边英雄群体在此涌现，皆因这里能让人感知昆仑之巖的脉动，

上图：班公湖。 马秋红摄